



# 当代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Trust Problem of  
Modern China

马俊峰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当代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Trust Problem of  
Modern China

马俊峰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 马俊峰等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7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3-13480-9

I. ①当… II. ①马… III. ①社会关系—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0798 号

---

|               |                                                                     |
|---------------|---------------------------------------------------------------------|
| 营销中心电话        | 010-58802181 58805532                                               |
|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 <a href="http://gaojiao.bnup.com.cn">http://gaojiao.bnup.com.cn</a> |
| 电子邮箱          | beishida168@126.com                                                 |

---

DANGDAI ZHONGGUO SHEHUI XINREN WENTI YANJI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5 mm × 238 mm

印 张: 1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

策划编辑: 曾忆梦

责任编辑: 杜丽娟

美术编辑: 毛 佳

装帧设计: 毛 佳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李 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目 录

|                               |         |
|-------------------------------|---------|
| 导 论 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高度看社会信任问题 ..... | ( 1 )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 .....          | ( 1 )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事业 .....        | ( 8 )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的唯一合理道路 .....    | ( 11 )  |
| <br>第一章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问题 .....     | ( 16 )  |
| 第一节 社会信任普遍缺失: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 ( 16 )  |
| 第二节 社会信任缺失的深层原因分析 .....       | ( 21 )  |
| 第三节 重建社会信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 ( 28 )  |
| <br>第二章 社会信任的多方位考察 .....      | ( 34 )  |
| 第一节 伦理学视野中的社会信任问题 .....       | ( 34 )  |
| 第二节 经济学视野中的社会信任问题 .....       | ( 39 )  |
| 第三节 政治学视野中的社会信任问题 .....       | ( 44 )  |
| 第四节 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信任问题 .....       | ( 48 )  |
| <br>第三章 社会信任的本质和基本形式 .....    | ( 54 )  |
| 第一节 社会信任的含义及其分析维度 .....       | ( 54 )  |
| 第二节 社会信任的基本形式 .....           | ( 57 )  |
| 第三节 社会信任的本质 .....             | ( 62 )  |
| <br>第四章 社会信任模式的历史变迁 .....     | ( 79 )  |
| 第一节 社会信任模式及其时代性 .....         | ( 79 )  |
| 第二节 社会信任模式与交往方式的历史关联 .....    | ( 82 )  |
| 第三节 传统的人格信任及其局限性 .....        | ( 86 )  |
| 第四节 从人格信任到现代系统信任的历史变迁 .....   | ( 92 )  |
| <br>第五章 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信任的双重作用 ..... | ( 101 )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契约文明 .....      | ( 101 ) |

|             |                                  |              |
|-------------|----------------------------------|--------------|
| 第二节         | 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现代社会信任 .....             | (105)        |
| 第三节         | 市场经济推动了现代社会信任的发展 .....           | (111)        |
| 第四节         | 市场经济对社会信任的负面影响 .....             | (116)        |
| <b>第六章</b>  | <b>现代民主社会对社会信任的特殊要求 .....</b>    | <b>(122)</b> |
| 第一节         | 公民：现代民主社会的细胞 .....               | (122)        |
| 第二节         | 守法与守信：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 .....            | (127)        |
| 第三节         | 维持公信：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体现 .....           | (131)        |
| 第四节         | 政治党派以及非政治性组织的信任问题 .....          | (135)        |
| <b>第七章</b>  | <b>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信任和国际秩序 .....</b>     | <b>(143)</b> |
| 第一节         |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交往及其主体 .....             | (143)        |
| 第二节         | 国际交往中的信任问题 .....                 | (152)        |
| 第三节         | 加强国际信任共同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 .....          | (156)        |
| <b>第八章</b>  | <b>社会信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b>       | <b>(162)</b> |
| 第一节         | 社会信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br>重要社会资本 ..... | (162)        |
| 第二节         | 社会信任与提高民族凝聚力 .....               | (170)        |
| 第三节         | 社会信任与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 .....          | (178)        |
| <b>第九章</b>  | <b>社会信任与人的全面发展 .....</b>         | <b>(185)</b> |
| 第一节         | 社会信任与人的发展阶段的相关性 .....            | (185)        |
| 第二节         | 社会信任与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 .....             | (192)        |
| 第三节         | 社会信任与人的道德素质的培育 .....             | (199)        |
| <b>第十章</b>  | <b>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信任的基本原则和途径 .....</b>  | <b>(207)</b> |
| 第一节         |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信任的基本原则 .....            | (208)        |
| 第二节         |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信任的基本途径 .....            | (215)        |
| 第三节         |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信任的优势条件 .....            | (224)        |
| <b>参考文献</b> | .....                            | (231)        |
| <b>后 记</b>  | .....                            | (233)        |

## 导论 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高度 看社会信任问题

我国理论界关注和讨论社会信任问题，是近年来才出现的事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社会信任的缺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首先是经济发展方面的损失，其次是整个社会发展方面的损失，引起了各个方面的不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社会信任不仅是一种很宝贵的社会资本，而且成了一种很稀缺的资源。如何看待和理解社会信任问题的重要性，重建我国的社会信任，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问题。与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不同，本书对社会信任问题的讨论，是一种基于哲学价值论的高度而进行的综合性的讨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学术视阈不限于伦理学，也不限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综合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对社会信任从不同方面进行理解和解析，既是一种价值心理，也是一种交往态度，既是一种社会资本，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对社会信任的作用，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信任的要求，都进行一定的分析。我们还注意到，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信任的模式也是不同的，社会信任模式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传统的人格信任模式已经过时，适合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信任模式只能是系统信任模式。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首先必须要从历史发展的高度，从现代化的视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视野，来彰显社会信任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考虑和谋划如何重建社会主义社会信任的问题。

###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

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物，从一开始就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和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认为它不仅不是理想的社会，而且是必须揭露和批判的社会。在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是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

睦相处的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的缺点,就是它们普遍地诉诸人性对于真理的服膺,认为只要是发现了真理,经过宣传和示范,人们都会向往真理所昭示的那样一种美好状态,按照真理所要求的去行动,这种美好的社会自然也就能够实现。而现实中的种种黑暗,只不过是人类的理性陷入暂时谬误的结果,一旦真理的阳光照亮了这些黑暗的角落,它们就会逐渐自动地消失。马克思一开始也是信奉这些理论的,后来经过艰辛的研究,创立了唯物史观,坚持从现实的人出发,历史地、辩证地看待社会形态的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既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也分析了它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即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从而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劳动是人类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形式,是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的最主要的特点,也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并包含了此后各种社会矛盾的胚芽。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能够冲破一切阻力,促使整个社会从低级向高级阶段演进,存在着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废除私有财产、消灭剥削绝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因为它们在道德上是不合理不正义的,而是因为现代条件下它们成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特别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的,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形态)对前一阶段(形态)的一种历史的超越和替代,是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正像一个人的青年阶段是对少年阶段的超越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同意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做是一种理想,一种现实应该与之适应的理想,而认为它只是实际地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运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还专门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或“真正”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空想的社会主义,力图划清与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界限。

历史的发展往往与人们的预料并不一致。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海外殖民地获得的超额利润,借助于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通过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改革,保持了生产力的持续发展,逐渐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暂时地度过了被“革命”的严重危机。而在经济政治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却爆发了由共

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并取得了胜利，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一度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东风压倒西风”的态势。可不幸的是，没过多久，社会主义阵营就因为种种原因而分裂和瓦解了，最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走上了市场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经验，有些东西我们会理解得更为深刻一些，看得更清楚一些。如果说，像中国和苏联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外强压迫和国内经济政治危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抓住了人民大众对当时国家统治者的极度不满而造成的革命时机，利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世界大战所提供的大好机遇，通过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的话，那么，在这个历史大变革的过程之中，也必然包含着另外一种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和重视的东西。这就是，这些为国为民不惜牺牲生命的共产党人，大多是一些坚定的理想主义者。革命实践自身的逻辑，也必然要求把行动的目标理想化，否则无法实行有效的政治动员，也难以坚定跟随者的信心。而在革命战争过程中包括地下工作中形成的许多特殊经验，比如领导人的意志通过铁的纪律和残酷斗争来贯彻执行、思想宣传工作的突出作用、军事化管理，等等，也很容易在革命成功之后，在缺乏经验的和平建设时期被普遍化地奉为有效的治国原则。这些都为后来的失误埋下了伏笔，成为遭受挫折和失败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在一次对外国友人的谈话中曾深刻指出，我们这些搞社会主义的人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急躁，想一下子就把事情办好，结果欲速则不达，好心办了坏事。把社会主义当做是一种理想化的东西，觉得手中有了政权，用政权的力量包括宣传的力量可以将全体国民组织起来，动员起来，经过思想教育，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在这种信念下，就非常容易忽视社会主义的高调的承诺与国家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容易忽视马克思所多次强调的生产力条件、交往条件和政治条件的历史重要性，也就很容易急躁冒进地按照自己的想象去设想、规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左”的思想长期能够存在，而且总是很得势的原因所在。按照马克思的思想，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绝不是因为它们不合乎某种道德上的正义，而是因为它们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如果不是这样，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劳动还是人

们谋生的基本手段,那么即使用强力消灭了阶级和剥削,它们还会在人们为生产资料而斗争的过程中死灰复燃。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在当时我们的这些革命领导人那里,即使不是完全不知道或不懂得的话,至少也是根本不重视的。只有在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之后,我们才懂得了马克思的这种科学思想的真正价值。

由于近代历史的复杂原因,中国没有经历完整的市场经济阶段。中国是被帝国主义列强强行拖进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而这些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目的是使中国成为它们获取廉价资源的地方和出卖商品的市场,它们并不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它们一方面需要反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和愚昧,需要打破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为扩大商品贸易赚取高额利润打开广阔的天地;另一方面又需要与中国旧势力保持着联盟,使中国保持更多的封建愚昧和专制的腐朽残余势力,因为这样就能拖住中国现代化的后腿,使之陷入长期的落后之中。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也就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时候。毛泽东就曾说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大都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也更以坚定地反帝反封建为职志。中国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农民革命,但与以往农民革命有着重大的不同,一是与城市工人阶级的结盟,二是由具有先进的指导思想的共产党的领导。这些革命者们都以为自己一开始就是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表,革命胜利了,民族独立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剩下的任务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没有看到,由于没有经过比较完整、比较彻底的市场经济阶段,也就是过去所说的资本主义阶段的洗礼,在整个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机制方面,在人们的思想观念领域,封建传统的遗毒仍然是很多很重的,反封建的任务是远远没有完成的。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包括工业化程度,生产分工和协作的程度,金融业的成熟程度,城市化和市民社会发育的程度,等等,都还处在一种很低的阶段和水平上。由此而规定的社会教育、卫生、公用事业发展的水平,社会公共生活的水平,人们的文化水平,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意识,也都处在一种很低的水平上。总之,我们完成的只是一种政治性革命,即掌握了国家政权,而不是社会性革命。社会

主义改造运动试图将整个社会关系进行彻底改造，但由于脱离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国情，形成了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本身就是一种急躁冒进的表现，是脱离生产力来理解生产关系的表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大跃进”运动造成了全面社会关系的紧张，只能又重新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法宝。从稳固政权的角度看，对内强调阶级斗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是具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大三角关系中，如果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借重资本主义创造的各种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推进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观念原本是在一定程度体现了这种方略的，可后来“左”的东西占了上风，轻易地改变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极大延误。

我们不仅没有把通过工业化和市场化来清除封建主义实现社会国家的现代化当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主要议题，而且更进一步的是不自觉地用带着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的眼光来看待市场经济等具有现代性的各种制度、措施、观念等，把它们都当做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来反对。这样，我们所理想的那种社会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那种封建的社会主义，是与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相背反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最突出的表现，越是在思想宣传上号召与传统进行最彻底的决裂，就越是在实践中回到传统中最落后、最污浊的那一面去。

比如评法批儒。中国传统的儒法之争有其历史的背景和原因。法家的那一套理论本来就是君主专制的思想基础，秦因法而兴，也因严刑酷法而亡。汉武之后，历朝历代统治者虽独尊儒术，实际上大都奉行阴法阳儒的基本国策，在整个制度安排上都按照法家的路数：君主高高在上、大权在握，将各级官僚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以此获得他们的效忠，鼓励官员们告密以了解政情防止作弊，一切法律都是维护皇权至上的手段，也是皇帝统御官吏和臣民的工具，皇帝的旨意就是最高的法律依据，也是一切是非对错的最终标准，如此等等。但为了掩盖这种赤裸裸的暴政人治，又用儒家的那一套忠孝节义来粉饰，使之具有一种温情脉脉的外观。

我们一方面把官本位强化普及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则对于市场、对于经商、对于赚钱，甚至对于货币，都沿袭着传统

的轻视、蔑视、敌视的眼光来看待，用封建的泛道德化的眼光观察一切，总觉得钱是万恶之源，一切想赚钱的思想都是可耻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国家把一切工业和商业都统制了起来，统购统销利归一统，用户籍制度、单位制度、村社制度将所有人都固定在一个地方一种职业上，禁止人们的自由流动，农村中的集市贸易也被当做是“资本主义尾巴”来批判、来取缔。这种种的政策和措施，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或倾向，就是阻隔社会化运动，割断社会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结果就是搞成一个个的封闭的“土围子”，重建和强化一种生于斯死于斯的“熟人社会”。这种种的政策和措施，尽管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之类的意识形态语言包裹着，其实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目的，就是为了便于管制。其根源，仍是传统的“牧民”思想，把老百姓当做管制的对象，说是相信群众，实际上根本不信任，从上到下的不信任。道德上不信任，能力上也不信任，所以才需要层层管着，从多方面管着。国家不仅要管老百姓的行动，而且要管每个人的思想，通过各种运动来实现所谓“思想的革命化”。

这种国家主义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违背着现代化的潮流的，是违背民主化的潮流的，也是违背着人的发展、人性发展的基本方向的。国家管得越多，管得越严，整个社会就越是缺乏活力，缺乏自组织自调节的能力，缺乏发展的动力，经济上如此，文化上也如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掀起了科技革命的浪潮，许多国家和地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都借科技革命的这股东风，积极发展经济。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都是借这次机遇而实现经济起飞的。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错过了这次科技革命提供的大好机遇。我们过去说，是因为搞了“文化大革命”，错失了机遇，可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搞文化革命，为何也都没有抓住机遇呢？现在看起来，深层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国家主义的垄断性的体制和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缺乏汲取科技创新科技成果的动力：工厂企业只是国家的生产车间，只要能够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就可以获得上级的表扬，各种社会事业单位对于使用新的技术手段没有什么积极性，庞大的科研机构也缺乏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动力，甚至正常的科研工作都受到了干扰，即使有了什么成果，只要发表了也就可以给上面有个交代了。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人家在封锁我们，我们也自我封锁，造成了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全面的盲目无知。外国的电台不能听，国外的报纸

也看不到，各种经济交流、科技交流、文化交流、人员交流几乎全处于一种冻结状态，可以说中国整个地游离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之外，而我们对于自己的落后和对于别人的发展不仅是无知，而且还是一种盲目的乐观和自大。

如果说，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狂热和急躁不是哪一个人的，而是一大批人的共同性的情绪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英明远见，倒毋宁说是前二十多年的失败实践造成的困境逼出来的。国民经济到了快要崩溃的边缘，群众的怨气也到了能够忍受的极点，社会各方面的矛盾都极端的尖锐化。尽管一开始人们对如何改革，朝什么方向前进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认识，或者说没有形成共识，但必须改革却成了最大的最普遍的共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终于摆脱了危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难之路。中国的经济不仅有了很大的发展，更为根本的是，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沿着现代化的路子进行的。我们扭转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偏见，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轨，从而真正开始了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的深刻性和伟大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来，它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一场真正的“凤凰涅槃”。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一改多少年来的沉闷死寂的状态，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动力。市场经济使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难以解决的物资“短缺”问题得到了彻底的改观。各种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产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民社会正在快速地形成，人们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制观念、效率意识、公平观念、创新意识等正在成为主流性的普遍社会意识。中国走向了世界，世界进入了中国，中国在商品贸易、国际合作、科技文化交流和人员交往方面都与全世界连成了一片。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在当前的国际事务中，中国正作为负责任的一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今天，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惨痛失败，经历了非洲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闹剧，中国也在获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之后，重新检讨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检讨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解，实在是可以获得许多深刻的收益的。社会主义，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是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是整个社会和经

济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结果,是克服生产发展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矛盾的一种解决方式,是个人发展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关系而进入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从而克服人的异化状态的内在要求。没有现代大工业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力的相当程度的发展,没有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交往体系对整个封建社会基础的全面的清除,没有建立在现代社会分工和合作基础上的全面社会关系的改造,没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工人阶级的壮大即人民群众的新型代表和历史活动主体的出现,社会主义就始终只能是一种空想式的、扭曲的、漫画式的东西。无论革命的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有着怎么样的良好愿望和坚定的信念,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都绝对是依赖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当这些条件还不成熟或还不具备的时候,强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按照一定的理想模式来进行改造,只能造成社会关系的扭曲和变形,其结果,既是对社会主义的损害,也是对本国社会发展的损害。社会主义只能在结合本国实际的过程中,按照历史条件和本国国情所提供的可能性,才能成为一种符合实际的有效选择,才能结出真正的果实。这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的事业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个原理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是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的。它不仅表现为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入,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其中来,也不仅表现为它是为了人民群众谋福利的事业,还在于它本身就是人民群众自身发展的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共产党作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领导者,绝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民群众,而只能是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觉悟水平,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能够为人民群众所认同所拥护的政策,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一起奋斗,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脱离群众就是脱离实际,因为我们所说的实际,包括客观的条件,也包括群众的利益要求和觉悟程度。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曾经精辟地指出,党的政策超过了群众的利益要求和觉悟程度,那就是“左”倾主义;党的政策落后于群众的利益要求和觉悟程度,则是尾巴主义和右倾主义。在党的方针和政策还没有为群众所理解的时候,那就只能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工

作，只能等待群众的觉悟，嫌群众落后，搞强迫命令主义，那是根本错误的。这些经验是非常宝贵的，也正是依靠着这些经验，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可惜的是，在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共产党生存的危机解除了，在胜利面前变得不谨慎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强迫命令的作风蔓延起来了，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总是嫌群众落后，逼着群众革命的“左”倾主义，而且越来越“左”，导致了整个国家建设工作的重大失误。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左”倾主义的东西一直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敌，是一种最危险的最有害的东西。凡是“左”的东西，总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好像很有理论根据，很容易欺骗人。更为根本的是，有些“左”的东西，也确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文本中能够找到根据，说起来理直气壮的样子。可问题是，当这些导师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有着一定的历史条件、问题背景和理论前设的，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来谈论和讨论这些问题的；而教条主义的对待这些论述时，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照搬这些东西时，这些东西就大都是超越了当时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实践发展阶段的东西，是多数人有疑问不理解从而有所抵触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往往都是从上面压下来的，是高层认为应该甚至必须做的东西。这样就势必造成上层领导与基层群众之间的对立，使得中层的许多干部感到为难和难堪。因为他们是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不顺群众的情绪，工作无法开展，可不执行上级的指示，又得受到批评甚至处分，所以一般都以消极被动的态度来应付。这同时也就为那些投机分子制造了可乘之机。他们顺着上面领导的意图，为获得上层的欢心，刻意压制群众的合理要求和意见，坚决执行难以取得效果的“左”的政策，而对那些对上级的脱离实际的政策有看法、执行不积极的干部则恶意中伤秘密汇报。凡是在“左”倾势力比较严重的地方和时候，往往总是形成一定帮派，以派划线，打击那些持不同意见的敢说真话的人，重用那些说假话、唱高调与“左”的倾向比较合拍的人，由此造成革命队伍中的混乱、不团结、离心离德，造成人际关系紧张、干群关系的紧张甚至对立。而越是对立，就越需要采取高压，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结果就更为对立，最终导致重大的损失甚至严重失败。而且往往还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不实事求是、不说真话而是揣摩上级心理唱高调、说假话的恶习很难在短

时期消除，被搞坏了的处于严重不信任和对立的干群关系、党内关系，在很长时间内都不易正常化，不易恢复。

完全有理由这么说，这些年来出现的社会信任方面的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社会信任的危机，固然与社会历史转型这个特定阶段有直接关系，但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改革之前的一系列“左”倾主义的方针政策的恶果，是“左”倾主义的遗毒的一种表现。

比如说，社会信任危机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信仰的危机。我们多年来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很大程度上是把它当做一种社会信仰、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来对待的，是为了树立起人们对未来的幸福生活的信心的，也是为了说明人们牺牲当下的暂时利益的价值合理性的。可有的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遭受了很多的苦痛，最后实践的结果，却是失败，他们的权利根本没有得到保障，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生活仍然很贫苦。这些人感觉自己受到了愚弄和欺骗，由此也就导致了他们对这种社会理想的怀疑和不信任。

人们接受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是与相信共产党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府联系在一起的。各种舆论工具都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是党和国家的喉舌，传递的是党和国家的声音。人们在很长时期内都真诚地相信共产党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表是不会欺骗老百姓的，报纸、广播是不会说假话的。可当人们通过切身体验，知道报纸和广播有时也说假话，知道有的干部根本不是人民公仆而是以权谋私的贪污腐败分子，知道我们的政府在处理有些问题时是不公正的，这样，事情也就向自己的反面转化了。人们开始不相信报纸、广播、电视上的那些宣传了，把它们当做是与商业广告一样的东西了，也不相信政府的一些政策了，社会主义的信念自然也就动摇了，各种急功近利的投机心理大量产生了，人们开始变得非常冷漠非常现实了。这里面就蕴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潜藏着爆发危机的真实可能性。

苏联的出现和解体毫无疑问是 20 世纪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两大事件。为什么在 20 世纪初苏联能够在那么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下来，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残酷斗争中作出那么大的牺牲而取得了胜利？关键是人民大众把社会主义看做是自己的事业，相信苏联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他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维护共产党的领导政权。可是，20 世纪 90 年代初苏联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当戈尔巴乔夫宣布共产党解散时，却没有任何人站出来表示反

对，没有人出来维护社会主义。即使是那些共产党员们，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也都无动于衷，静悄悄地看着苏联的红旗落下，没有人悲哀，没有人惋惜，有的只是一种看客式的冷漠。这种巨大的政治冷漠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人民已经不再相信苏联的共产党和政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了，表明人民已经把共产党是不是倒台看做“他们”的事情而不是自己的事情了。

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大众的事业，它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获得持久的动力，才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就像一个人应该把信誉当做是自己的社会生命一样，作为旨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共产党，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府，都必须特别注意自己的公信力问题，注重自己的信誉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一定要以人民群众的立场作为自己的立场，以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和觉悟程度作为自己制定政策的基本标准。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支持不支持作为检验自己的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基本标准，一定得自觉地接受人民大众的监督和批评，这是获得人民群众信任的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途径。社会主义正在探索中前进，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但作为党和政府，要有敢于承认错误的勇气，越是敢于向人民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越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越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和支持。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经验，我们应该看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始终是一个影响全局性的基本矛盾，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始终是一个最大的危险。只有紧紧抓住这个矛盾并处理好这个矛盾，有效地防范和化解这个最大的危险，使人民群众真正相信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机构干部是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了群众谋利益的，从而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信任，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获得最牢固的基础，一些暂时的风险，多变的国际形势，突发的恶性事件，就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

### 第三节 社会主义是发展中国的唯一合理道路

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也经过了六十多年的实践，尽管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走过严重的弯路，犯过严重的错误，我们毕竟通过这些挫折和弯路找到了一条有中